

北大硕士当起“外卖小子”

杭州南星桥太平巷新工社区内,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几份热乎乎的快餐正在打包。

这是一家6月新开的快餐店,总共才5个人,除去大厨和帮忙的伙计,剩下的全是老板,也就是合伙人。

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杨圣恩,一位有着近20年酒店从业经历的社会人士;徐晓雷,悉尼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小文,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小徐(左)小文每天对完账后,还要商量一下明天要做的事

送外卖被保安踹了出来

“外卖小子”徐晓雷正在接电话:“送哪里?哦,知道了。10分钟后送到。好的,再见。”

在本子上迅速记上两笔后,小徐朝厨房喊,“楼师傅,10元的香炸鸡排套餐一份。”

厨师楼斌马上点火开始烧菜。按照菜单,香炸鸡排套餐包括香炸鸡排、鱼香肉丝和时蔬小炒两样。

多加快餐配送中心的菜单主要分10元和8元两种,共4种套餐。比如今天的菜单上,有10元的粽香鸡腿套餐和干菜扣肉套餐,还有8元的红烧鲳鱼套餐和尖椒熏肉套餐。

徐晓雷已经送了半个月的外卖。他最得意的是,刚开张时,就成功潜进了附近的一幢商务

大楼,每个楼层都发了传单。

生意上门,徐晓雷自然担当了送外卖的角色。不过,第一次外送,就被保安逮住了。

“他竟然一脚把我踹了出来。”徐晓雷摆了一个踹的动作,强调说,“真的踹哦,不是摆个姿势而已。”

徐晓雷讲得兴高采烈,可听者就想不通了,两个硕士高材生,怎么就这么心甘情愿当上了“外卖小子”?

是怎么聚到一块儿的

徐晓雷去年7月从澳大利亚学成回国,后来进了一家教育培训公司,月薪4000多元。

小文是徐晓雷高中、大学校友,现在有一份固定职业。

巧的是,两个年轻人,都对饮食健康颇为关注。徐晓雷是

因为在澳大利亚接触到了新的饮食习惯。而小文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他曾在考研期间因不规律饮食导致肠胃功能紊乱持续近一年,所以后来对合理膳食尤其在意。

两人都对餐饮行业有意思,可他们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经验。恰好,他们在一次活动中偶遇了杨圣恩。杨圣恩看中他们两个“年轻有知识”,而自己做过酒店总经理、餐饮公司培训专员、前厅经理等,经验足够了。

“这是一项从事健康的事业,能把我们的理念,贯彻到营养、卫生、原料选配、配送、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中。”三人一拍即合。

父母说他们是在瞎折腾

徐晓雷挑了五一节,跟父

母说这事。

饭桌上,他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说了句:“我想做快餐。”

老徐愣了愣,看了他一眼,没吭声。

小徐终究按捺不住,倒豆子一样全抖了出来。“我觉得做快餐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一行是很实在的事情,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品质。对年轻人来说,创业是一种选择,一种理想对现实的挑战。”

老徐今年50多岁,出身浙江青田的他从小务过农,做过工,这些年来一直在乌克兰做生意,近两年才在杭州买了一套房子,定居下来。一次性付款,再加上装修,夫妇俩多年积攒的老本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不过,总算儿子还争气。2006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又去悉尼大学读了个教育心理学硕士,最近还考到了心理咨询资格证。周围亲戚朋友说起来,都说他好福气。

“做教育这一行不是挺好的嘛。”老徐想了想后,扔出一句话,“反正你要做可以,要钱没有。”

第一次谈判双方不欢而散。老徐对儿子的设想一直在变。最早希望儿子能当官,后来觉得还是做医生或老师最好,受人尊敬。他自己当过农民、工人、商人,也跟各个领域的人打过交道,如果让他选择,他更愿意和医生、教师做朋友,因为这些职业有社会意义。

儿子读了教育心理学,既可以做心理医生,也可以做教

师,他很开心。但没想到儿子想去卖快餐,花这么大成本培养,结果去做技术含量这么低的快餐,他接受不了。

我的青春我做主

徐晓雷的叔叔都出动了。可是小徐心意已决,带着杨圣恩和小文一同到了家里,对父母进行说服工作。

“我看到他们的杨阿姨(指杨圣恩)比较沉稳踏实,而且年龄和工作经验也适合创业,就同意了。”老徐最后还是让步了。

晓雷妈妈还是有点想不通。看着儿子才干了一个星期,就瘦了很多黑了脸,心疼得要命,不停地念叨,还是教书好。

而小文则遭遇了更大的抵制。他妈妈听说这个消息后,直接骂小文“胡闹,瞎折腾。”

父母坚决反对,天天都在给小文做说服工作。小文干脆瞒天过海,跟姑姑借了点钱,先跟徐晓雷、杨圣恩他们一起做起来。

“我们不如杨阿姨能干”

做起来,两个高材生才意识到,经验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杨阿姨比他们能干太多了。

大到场地租用、设备采购,厨师雇佣,小到每天原材料的采购,全由杨圣恩完成。小文和小徐为此很愧疚,让杨阿姨一个女人做这么多事情,甚至连上小学的小女儿都照顾不上,导致小女儿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不过,杨圣恩完全不是这

么看的。他们很谦虚,对于身份的差别,适应能力非常强。

“我们5个人经常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吃饭,一起交流。送外卖的过程中,受到委屈,他们回来也说,不过都是笑呵呵地说。”杨圣恩说,这让她有些没想到。

徐晓雷说,这得益于他在海外读书时的经历。“我经常跟流浪汉聊天,当然,也跟高层次的人交流。职业身份不分高低贵贱,人的价值决定于你贡献了什么,而不是得到了什么。”

他们团队里,很流行一句由杨圣恩最先提出来的话:“我们一起去用最高的理念去做最普通的事情”。

小文告诉记者,别人一直给他们贴上“高学历”标签,而他们也确实有些新的理念。

“现在的快餐只追求吃饱,而我们追求营养搭配,而且根据不同人群推荐不同的营养搭配。”他说,“我们正在学习《杭州市民健康生活手册》,争取在一段时间后把合理营养的搭配引进到我们的餐品设计中,我们更希望得到杭州市健康卫生办公室在营养搭配方面的指导。”

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现在多加快餐配送中心每天都能送出四五十份快餐,不过他们需要70份才能保本。

徐晓雷很心焦,觉得自己应该腾出更多时间来市场开拓的工作,他正在物色能够送快餐的员工。

据《今日早报》

为进监狱治病 他故意偷牛

一名男子从1992年开始,不间断地犯盗窃罪而屡进监狱。面对如此频繁的盗窃入狱,检察官问其为何不知悔改?竟答:为让监狱治病

病人罗娃

2007年8月8日,立秋。

听说有记者采访自己,罗娃刻意去街上一个经常赊账的饭店里借了块肥皂,认真洗了把脸。当罗娃站在记者面前时,散发一股当地肥皂特有的味道——不是很香,但也不刺鼻,甚至有几分剃须泡沫的味道。

事实上,罗娃那天真的认真刮了胡子。剃须的工具是借别人的一把剪刀——为了刮掉胡子,他在门前的一块山岩上磨了40分钟。最后,他成功地去掉了两鬓和颌下仅有的几十根胡须。几个月前,大夫告诉了他胡子不旺的原因:肝部肿大、胰腺炎、气管炎、肺气肿、胆结石、肾结石、甲亢、低蛋白血症等十种重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荷尔蒙分泌。

大夫还偷偷告诉陪罗娃检查身体的重庆江津市四面山管委会民政干部余光:得赶紧给他做手术啊,这样下去人可就不行了,也就两年的光景吧……

罗娃一贫如洗。他不可能给自己治病,甚至没有填饱肚子的能力。然而,在小镇上,没有人讨厌这个身染多种传染恶疾的中年男人。“罗娃人不坏哦,从不讨人嫌、也不乞丐,只要看见谁需要帮忙都主动上去帮帮,还帮我婆姨从汽车站拎过好多次行李哩!”四面山镇“好味道饭店”老板唐德贵,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说。

“罗娃人真的不坏哟,人还挺勤快的,上一次‘保外就医’时,我还给他找了个给烧

烤摊老板放羊的工作,他干得很起劲。”时任四面山派出所指导员邹井云,认真纠正着人们对“服刑犯人”的偏见。

偷牛的意外收获

两年前,邹井云曾用如下文字记载了罗娃的前半生:1965年出生在江津市一个林场伐木工人家庭,在四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不幸的是姐姐和弟弟先后去世。从小在贫困生活中长大的他在父亲退休后,接班在农场工作。其间,还有了一次恋爱。然而此后不久,他便因酗酒斗殴入狱六年。

1992年的8月,罗娃第一次犯罪。

那一年他和恋爱了两年的女友为一封情书的用词是否贴切大吵了一架。晚上几名林场的工友邀他出去吃饭,酒后他和工友发生了争吵,罗娃操起了饭馆后厨的菜刀,工友被鉴定为重伤。罗娃在第二天酒醒的时候被送进了看守所,法院判决入狱六年。

恢复自由的那天晚上,他打听到曾经的女友早已远嫁他乡。痛苦的罗娃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打工12个月后,罗娃给自己积攒了1000块钱。由于牵挂唯一的亲人,罗娃于1999年的年底回到了重庆老家,并决心为年迈的父亲尽孝。

然而就在此时,他病倒在父亲的床榻前,花光了所有积攒的钱后,罗娃想到了偷。

农村最值钱的东西是牛,因为它是山区不可取代的劳动工具。忍着腹部剧痛的罗娃,那天起了个大早,并在寒冷的冬夜里钻进了邻村的牛棚。牛不好偷,但是很好卖,罗娃很快得到了1300块钱的赃款。

之后,他匆忙跑到医院给自己治病。由于口袋里的钱不够做手术,他只得拿着药方到药店买药,然后一溜烟地跑回家。48小时后,警察就找到了

刚刚服用过5次药的罗娃。

“第一次偷东西嘛,也没有什么经验,警察沿着牛蹄印,两天就把我抓住了。”罗娃说。这次,他被判了三年刑。在监狱里,罗娃的病发作了,“没有想到监狱的大夫开始给我吃药、打针,几个月下来病竟然好了许多!我当时很高兴,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监狱有规定,像我这样的罪犯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罗娃谈起在监狱的意外收获时,眼里闪烁着万分欣喜的希冀。

罗娃的办法

2003年10月,罗娃第二次走出监狱。10个月后,他的老父亲离开人世。孑然一身的罗娃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三年内开镇上最好饭店”的目标。

然而,病痛很快摧毁了罗娃所有的幻想。丧父之痛和五脏六腑的剧痛,让身高1.78米的罗娃佝偻成一个矮子。没有钱,只有病的罗娃想到了监狱,还有监狱里的大夫和药。

于是,他再次偷牛。

有了第一次的作案经历,这次罗娃更是得心应手——趁着黑夜,忍着剧痛,他牵着黄牛一会走土路、泥路,一会走柏油路、水泥路,因为这样可以给警察留下更多的线索,以便自己尽快被抓。天亮的时候,罗娃走到了较远处的一座山下,警察很快循迹而至。

“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丢失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罗娃似乎很得意自己的设计。

罗娃这次被判了1年零10个月。例行身体检查时,病情被监狱的大夫发现——这是在罗娃预料之中的。

江津区法院公布的数字显示,自2004年9月开始的1年

10个月刑期中,他们共为罗娃花去各种医疗费用3000元以上。

“无忧无虑生活”很快到头了。罗娃离开了监狱,他不想离开这里。“我很想离开,因为我渴望自由。但我更不想死。对我来说,没有生命,自由还有什么意义?”

意外的“保外就医”

被释放后,罗娃径直来到派出所,找到了时为副所长的邹井云。“我想让你给我开个后门,给我安排个工作,我不能就这么饿着吧?”

邹井云被气乐了,但还是答应了罗娃的请求。不久,罗娃就到镇上的一个烧烤摊上给人家放羊。“他很卖力地放羊,从不偷懒,并且为人勤快、善良,是典型的山区良民形象。”邹井云说。

但病魔让罗娃丢了这份工作。罗娃再次决定偷牛。于是一切照例,2006年2月的一个凌晨,罗娃一手捂着肚子,一手从邻村的牛舍里牵出一只耕牛。警察如期而至。

然而这次他的如意算盘却打空了:被江津法院判处一年零10个月有期徒刑后,罗娃当即被有关方面“保外就医”,安排到四面山监狱外执行“就医”。

“你们把我送进监狱里吧,求求你们了!这样不是要我死吗?”2007年8月,罗娃当着记者的面冲着邹井云大呼小叫。看着恼怒不已、张牙舞爪的罗娃,邹井云副所长表情复杂。

“那个时候,他身体基本到了无法自理的地步,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钱,也没有人照顾,罗娃当时咋个过的啊?”和罗娃同岁、一直被罗娃叫做“嫂子”的余光荣捂着眼睛说。

为了不让罗娃就这么活活饿死,在管委会负责民政救济的余光荣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违规为罗娃申请低保救济。这个决定还得到了当地派出所

的支持,很快邹井云就为罗娃开好了民政部门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

要知道,这时罗娃还是一个处在“保外就医”期间的服刑犯,根本没资格申请低保。

余光荣和邹井云硬着头皮,先后五次给罗娃递交了低保申请。2008年2月11日,低保终于申请成功。这时,距离罗娃最终服刑期满尚有4个月零6天。

罗娃的幸福生活

“那一段时间,他过得很舒服,可以看得出来。有时还哼着小曲到街上四处逛逛,偶尔看见别人需要帮忙,也会主动上前招呼,看来每月的低保救济真的帮了他的大忙。”四面山派出所社区民警彭小奇回忆说。

“本来申请的时候是每月150元,后来我们感觉确实不够他用。我把给他的救济款调到了最高的一档,这样一个月他可以拿到的就是275元了。”

有钱之后的罗娃为了省下更多的钱买药,把很多好心人捐给自己的、质量好点的物品重新扛回了超市。

在四面山森林资源管理局工作的刘仁福,2008年6月份专程跑到大型超市给罗娃买了一袋“珍珠大米”。第二天罗娃就吃力地扛着这袋25公斤的米来到超市,软磨硬泡硬是换回了两袋同等重量的本地产大米。

会过日子的罗娃,生活中还非常渴望参与集体活动。他走进了老年人经常打牌的活动中心,那次他和镇上的其他人玩了一下午的“双升”。

“那天罗娃兴奋得不得了!”牌友回忆说。那天他输了5块钱,但是却玩得很开心。不过听说罗娃参与“赌博”后,帮助过罗娃的人都很生气。余光荣严厉批评了罗娃:“你现在看病都困难,你想想看,怎么能够去‘赌’呢?”

从那次以后,罗娃再没有

打过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罗娃之死

“他染的这些病都不轻,每种病都可以让他丢掉性命。要是能够手术就好了,通过手术治疗的话,应该还有很大希望。”长期关注罗娃命运的记者在咨询过大夫后作出这样的判断。

根据重庆市江津区官方网站提供的消息,该地区针对普通百姓的“合作医疗制度”自2009年初开始在各城镇、农村大规模普及。这个医疗报销标准规定,百姓患重病、大病时,最高可以报销3万元左右。

然而罗娃没有等到这一天。2008年11月11日凌晨,在和疾病斗争了多年后,罗娃离开了人世。江津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搬动他的时候发现,死去的罗娃手中还紧紧握着那本“低保救济凭证”。

“他真的不想死,他有很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走那天,我没敢去那个小屋子里看他最后一眼,没敢……”邹井云说。

“听说他死的消息后,我心里很难过。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人用憨憨的声调怯怯地叫我‘嫂子’了,罗娃本不该死的啊,可是他好像也没有不死的理由……”余光荣抹了一把眼泪。

“罗娃死了也好,比他成天捂着肚子痛苦地嗷嗷叫总是要好些,因为现在他再没有痛苦了……”唐德贵边给客人倒水,边小声嘟囔。

罗娃就这么死了,在他生活了43年的故土上,他甚至没有能力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坟头。由于没有人认领骨灰,江津市殡仪馆按照“无主灰”的规定深埋在距离火化车间仅300米的山丘上。那个山丘如今已被铲车推平,上面铺设了黝黑的柏油和石子儿。在江津市的地图上,这条路叫迎宾大道。

被忽略的还有他的大名——罗万富。据《中国周刊》